

# 博学儒雅 心系故土

——深切怀念余光中先生

■李景端



2006年本文作者在香  
港与余光中(左)合影

面叙。接触多了,不仅没了那种拘谨,交谈的话题也越来越广泛了。余先生的文学造诣和成就,名扬两岸,无需赘言,我只想缅怀几桩印象深刻的故事。

余先生每次作讲座,都充满对中华文化的高度钟爱。我听过或读过他许多称颂中华文化的论述,精彩的如:“对于全体华人赖以联系的华文来讲,语言是我们的命脉,围绕着我们的是一个中华文化的同心圆,圆心无处不在,圆周无处可寻,半径就是我们的华文。半径有多长,华文就有多长。”也许因为他是诗人兼散文作家,所以对这两种体裁,更有精辟的见解。他说:“散文,是一切作家的身份证;诗,是一切艺术的入场券。”又说:“科学是忙出来的,文艺是闲出来的。科学家追求效率,艺术家追求美与理想,这是两种不同的心态。闲不是偷懒,而是让心灵从容不迫地发展,像花开那样,不能用化肥催它开。所以你必须追求人文的价值。”上述这些比喻,充满诗的语言,令人回味无穷。

余先生非常期盼和鼓励全国各地的青年多多开展文化交流。他在一次点评这个奖获奖作品时

说:“内地同学偏重写实,香港同学注重叙事,台湾同学则富于想象,各有长处,都很有特色。”还说:“这届散文组冠、亚、季军得主,正好来自台湾、香港和大陆。我知道参赛者姓名都是密封的,三地同学平分三甲,绝非刻意安排,显见三地年轻人的华文水平不相上下,都在进步。”

缅怀余光中先生,必然会想起他那首脍炙人口的《乡愁》。几十年过去了,社会环境变化很大,他对“乡愁”一词,又注入了什么样的感受?在香港一次讲座时,有

位同学问他现在还会有“乡愁”吗?余光中短暂沉思后深情地回答:“当然有,每个人都会有‘乡愁’。一个人离开一个地方,不管时间长短,往往对所处过的环境,接触过的人,经历过的事,都会不经意地回想或重现。譬如说,我在台湾住久了,一旦去了别的地方,那我对台湾也会产生一种‘乡愁’。‘乡愁’凝聚着对故土的眷恋,对故人的怀念,对往事的回眸,对人生的回味。‘乡愁’是一种情愫,也可以说是岁月的痕迹,所以,人人有‘乡愁’,长久都会有‘乡愁’。”一席话,立刻博得一阵掌声。

余先生的“正经”诗,许多人都熟悉,而读过他“打油”诗的,恐怕就很少了。在一次香港中文大学的晚宴上,因有余先生在场,特意安排了男女声组合,朗诵了《乡愁》《灵感》《等你,在雨中》等多首余先生的抒情诗。随后主持人问大家:“刚才都是别人朗诵余光中先生的诗,好不好?”那天余先生喝了几杯酒,心情很好,应声走向宴会中央,用他惯用的慢语速说道:“刚才你们念的都是我的正经诗,现在我要向大家念一首我的不正经

诗。”这句卖关子的话,顿时引来一片笑声,人们怀着期待的眼光,想听听这位彬彬有礼的大学者到底会说出什么样“不正经”的话。只见他顿了一会儿,没带稿子,就开口念道:

如果菜单浪漫,它就会是诗歌;如果账单清醒,它就成了散文;投稿那点稿费,只不过是小事;食物中毒,呕吐,那就是批评。

他念完解释说,这是他同几位文化界朋友在台湾饭馆一起吃饭时,兴起有感而作。因为这些朋友都经常写文章投稿,面对样样上涨的物价,大家慨叹唯独文章不值钱,投稿的稿费少得真好比给小费,有时还分文没有,白辛苦。而且,好处没得到,往往还要挨批评。这当然是饭桌上文人的牢骚话,所以说它“不正经”。不过,牢骚归牢骚,谁也没有因稿费低而不写,这大概就是文人气质吧。

这段简短、风趣的补白,又引来一阵掌声。

2013年我最后见到他,他已85岁高龄,依然精神矍铄,思维清晰。他告诉我,自己还能开车去上班,坚持在教书育人。我期待他来宁时再相聚,哪知仙鹤西去,无缘再会。近日看到他10月90华诞时吟的诗:“黄栗留鸣桑椹美,紫樱桃熟麦风凉。朱轮肯愧无遗爱,白首重来似故乡。”这无疑是他留给人生的绝唱。尊敬的余光中先生,安息吧!

(上接第一版)在这个情况下,这套通史就会有重大的作用,人们会更重视此书。其实,我研究行政区划,不是强调行政区划的重要性,相反,是希望在经济上打破行政区划的封闭性,建立跨行政区划、甚至无视行政区划的经济圈。我巴不得行政区划不起作用,我们的经济才能腾飞,按经济的规律需求去发展,这一点可能出乎很多人意料。

**读书:**您主编的这套通史,经历了十年的策划,而从第一部总论出版开始到各朝代的分卷陆续出全,又花了10年,以至于这套13卷的通史全部出齐后,又在2017年12月推出了全书的修订版。前后20年的投入与努力,在我国当代学术史上实属罕见,非常了不起。有学者感叹,在今天的高校学术界,要想再集结起这样一批全国顶尖学者,花20年时间共同投入一个研究项目,可能是“后来者”了。能说说您在这个过程中滋味?

**周振鹤:**我就是尽了我最大的努力来完成这个事。确实,这么大的学术工程,放在现在的高校可能的确很难完成,非常不容易。谭先生在世时,毛泽东主席想看中国疆域政区历代变迁的地图,周恩来就让谭先生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本以为三四年能完成,但谭先生很认真,觉得不能只是把老的杨守敬《历代舆地图》改一下就行了,要重起炉灶,结果这项研究他一做就是20年。《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撰是当时中央的意图,举全国之力,调集一批人,给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且当时没有业绩考核,经费也不限。谭先生当年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有行政支持,我们现在没有,只能是一批人志同道合的协作。当然这套书也是立了自然科学的项,立了全国社科的项,名誉上对参与者是有点鼓励,但当时的经费是不多的。

主编的过程当然有不少故事。像李昌宪先生写《宋西夏卷》,他很早就交稿了。《民国卷》也很早就交稿。当然有的朝代比

较复杂,会稍慢一些,这也是正常的。有时候参与的学者也会叫苦,因为本身都还有其他科研任务。有问题我就和他们互相商量着解决。中间有几位学者因研究上耗费精力太大而放缓交稿,后来有青年学者参加进来救场。因为这个通史如果少一卷都不行,它就出不来了。此外,各卷要力求保持框架的基本一致以及风格的大致统一也是很不容易的。作为这套丛书的组织者,我要衷心感谢诸位学者同仁的合作与支持,没有大家的学术奉献精神,这部书是不可能顺利完成的。

**读书:**这套通史完成后,对您的个人学术生涯有何意义?

**周振鹤:**这是历史上第一部各朝代连续的,但又是每个朝代详尽的断代历史地理研究著作,过去从未有过类似的总结性整体性的著述。我在《总论》里,把历史行政区划变迁的基本规律作了一些总结,行政区划的结构实质如何,层级与边界有什么基本变迁规律等等,以及一些理论基础等等,都尝试写下来,另外厘定了行政区划研究的一些基本术语。

我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直思考这些问题。比如“政区地理”这四字的术语可以算是我用开来的,断代的政区地理研究算是从我的博士论文《西汉政区地理》起步的吧。再比如关于县的起源的研究。管县的那一级政区叫“统县政区”,这个名词算是我发明的。因为秦时管县的政区叫郡,有人就把它叫郡级政区,但隋唐时管县的政区叫府,怎么办呢,叫府级政区?不一致。还有的人想了个办法,叫一级政区、二级政区,这也不行,因为各朝代的行政级数不一样,容易混淆起来。秦时只有两级政区,郡以下就是县,而到了宋代是路—州—县三级,明代就是三四级政区混合,所以称一级、二级、三级政区这个办法不行。1990年我写《体国经野之道》时,我想了很久才想出“统县政区”这个名词,“统县政

区”上面叫“高层政区”。因为中国政区变化再复杂,都可以分成三层,最上面一层就称“高层政区”。我这个想法提出后,几乎所有的学者都在使用,在这之前学界对这些术语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称呼。

**读书:**您曾说过,复原历代行政区划变迁全过程的关键问题是史料的不足,能否举例?如何克服?

**周振鹤:**资料方面,传世文献倒不难弄,有多少即多少,但比较分散。年代越到后来越分散,所以要有办法找到所谓有用的材料。历代正史的地理志相当复杂,必须详细解剖分析。对于地理志以外的与地理相关的史料则要善于发现、细绎、整合、条理与规范。材料不足时还要适当应用逻辑推理来弥缝历史链条的断裂。早期的材料很有限,就要注意考古的东西,用出土文献来弥补传世文献之不足。一有出土文献出来我们就修订。有新的出土文献出来,我就很兴奋,因为这样就越来越接近事实。

司马迁写《史记》,对秦朝如何划分全国行政区划,就一句:秦“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后来到清中期大家开始知道,秦统一天下时是设36郡,后来应该有所增加,有40郡等说法,再后来王国维提出秦最后有48郡。我曾跟谭先生提过,王国维提出48郡之说,就单个郡名讲不一定准确,但总数48郡是有可能的,因为秦这个朝代很重视6这个数。谭先生过去认为,实际上有多少郡就多少郡,不必非说48郡。但后来谭先生在《图说》中修正了他的观念。一般人不注意这个学术细节,引用谭说还是用他在《秦郡新考》里的结论。司马迁写《史记》,对人事关心,对地理不关心,对政区他就写一句“分天下三十六郡”,余则不及一语,以至后世学者为了复原秦朝面貌而长期聚讼纷纭。等差不多确定了这些郡名,结果里那秦简一出土,竟出现了洞庭郡、苍梧郡这两个我们过去从来不知道的郡,于是不得不重新考证整个秦郡的体系。

有时候,行政区划历史变迁的研究似是智力上的挑战和思维上的游戏,像在解数学题,有时真像是在解联立方程。光是一元方程解决不了,因为未知数不止一个。

**读书:**参与这套通史编著的学者都发扬了学术研究中的“工匠精神”,力求把各自领域的研究做到极致,所以这套通史可以说代表了目前中国历史政区地理研究中的最高水平?

**周振鹤:**断代政区地理要做到极致,我们确实做到了。我们的原则是能做多细做多细。留下尽可能详细的研究成果,而不管它是否烦琐。所谓烦琐,就是将颊上三毫都体现出来了,这样更像历史的本来面目。过于烦琐的部分并不一定要大众理解,而是要让专门家利用,并留下一份说明研究者智慧的记录。今后的学人可以补充,可以纠正,甚至可以重写,但这部通史却是轻易绕不过去的一块砖头。

我用“横看成岭侧成峰”来形容这套通史:单独看,每个朝代都是一个山峰,每一本就是一个断代政区地理,整体连起来看就是一片连绵山岭,是一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其中,李晓杰撰写的《五代十国卷》特别厚,尽量把每一年的变迁都整理出来,细针密缕,仅仅50年的史事,他用了50万字。还有余蔚的《辽金卷》也很不容易。辽是最难写的一个朝代,史料几乎只有一点点。有人说,为什么有的朝代延续两三百你只写一点点,五代才50年你写这么厚。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动乱时代行政区划可能变动得多,统一时代有时候变化反而少。二是越到后期的著作,汲取前期的研究成果越多,做得自然也就越详细。

我要深深感谢这套书的所有参与者,都以艰苦的考证研究为己任,行不由径——要走大路,从不企望走捷径。因为走捷径就可能出毛病。我们就是每一步的考证,每一句话的写作,每一章节的分布安排都要有根据。